

主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乡村社会卷

minguoshiqi shehuidiaocha congbian / erbian
XIANGCUN SHEHUIJUAN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主编 李文海 ©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乡村社会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社会卷/李文海
主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334-4930-8

I. 民… II. 李… III. ①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
民国②乡村-社会调查-调查报告-中国-民国 IV.
D693.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620 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社会卷

主编:李文海 副主编:夏明方 黄兴涛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350012)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69.75 字数 1486 千 插页 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100

ISBN 978-7-5334-4930-8 定价:19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社会调查: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一场“真正的革命”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前言

两年前,由我们主编的十卷本《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甫经出版,即刻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纷纷建议我们要将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作为编者,我们自然倍受鼓舞,但也深知这样的情况,与其是对编者的鼓励,莫如说是对那一时代倡行社会调查之众多先驱者的赞誉。正是这些先驱者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和不厌烦琐、脚踏实地的严谨学风,才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纷扰不已的乱世硝烟散尽之后,仍然给我们留下如许丰富的数据,如许多彩的文字,让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以及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如许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应该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这大约也是今日矢志从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们共同的心声吧。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社会调查,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国家建设,仍是需要大力践行的事情,但毕竟已经司空见惯,基本上是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当初它在中国的兴起,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却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破天荒的新事物。那一时期被誉为对这一运动“鼓吹最力工作最久的一员勇将”——李景汉先生,曾经非常自信地把它称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认为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方法从根本上来革命”,“是要实现以科学的程序改造未来的社会,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国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社会调查在今日中国之需要》,《清华周刊》第38卷第7、8期合刊,1932年11月21日)

对于李景汉的这一判断,我们只有把它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和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地去理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由不断的外力冲击而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向以“中庸”自许的国人,却偏偏要在势若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之间走起钢丝来。民国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致力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这样说道:“从

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现实的社会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的整个的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和制度,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序》)也就是说,不管是顽固的复古主义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他们在讨论国是之时,都把真实的国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更有一班激进的革命虚无主义者,举凡中国固有的一切,无不置于打倒之列。用李景汉的话来说,那就是“孔子打倒,礼教打倒,旧年迷信打倒,马褂打倒,反动打倒,知识阶级打倒,总之,古传的大半及目下见到之事物少有不在打倒之列者,有大刀阔斧一扫而光之势”。但是光是打倒一切而不是同时致力于建设工作,结果只能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一切依然如故,甚至更加鸡犬不宁。当然,李景汉并不是不主张“打倒”的复旧者,而只是认为,“打倒之主意既经拿定,不打则已,苟其打之,必使其一打而准倒;且首先研究打倒后之替代物为何,否则且慢打倒”。而要做到这一点,亦即找到一条有效的民族自救的出路,“必先根本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必先从社会调查入手”,否则,要“以他国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只能是“穿洋靴于缠足”,不伦不类了。显而易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之大力鼓吹和倡导社会调查,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激荡人心的转型过程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或者说是国人的认知观念对社会剧变的一种反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此前已然发生的种种现代化努力的一种深刻的反思。因而,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理所当然是当时蓬勃而起的改造中国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以往对于“革命”的狭隘定义,这样的社会调查运动,理所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生于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何况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革命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也是很早就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后来由城市转向农村的革命过程中,这些绝大多数接受过现代社会科学教育的革命领导者,更是把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定和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致国外有学者把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调查,称为国内外最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

但是要将这样一种在西方近代社会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移植到当时的中国来,却又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一种悖论,也就是说在一个基本上不具备社会调查土壤的传统社会搞调查,搞得不好,或许同样也会像其所批

评的全盘西化论者或革命虚无主义者一样,陷入“穿洋靴于缠足”的困境之中。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叫《差不多先生传》的寓言式传记,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不求精确、不讲效率、马马虎虎的行为习惯给予辛辣的嘲讽,然而这样一种在西洋镜透视下的“懒人”,对于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说,恰好

外,亦不曾忘怀“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这样的贡献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事实”与数据的生产与保存。这样的“事实”,既不是那些经过时间的冲刷而无意识遗存下来的零散的记载、片段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亦非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或走马观花式的表象叙述;这样的“数据”也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在不少学者的眼中,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然而纵观宇内,我们又何曾能够找到没有人工斧凿痕迹的“原生态”资料呢?相反,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都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就使得利用者可以借此对调查者的描述或分析之可靠与否和适用范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

其二是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这就涉及到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演进过程之中所谓“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的调查”(或“社区研究”)这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也体现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演进方向与趋势,即从统计型的“社会调查”到民族志式的“社会学的调查”(实即人类学调查)的转变。

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的导论中回顾自己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时,对其早年的研究工作如《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作了一次“痛苦”的反省,认为那个时候“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结果不仅“埋没了许多颇有意义的发现”,而且因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经过这两次实地研究的磨练,费孝通吸取教训,幡然改辙,按照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的指引,舍弃那种“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

不逊色,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乡村调查,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造农村的道路,就与费孝通的研究结论大不相同,而后者与李景汉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力行社区研究的燕京学派,其最初的社会调查主要就是在与李景汉持同样主张的许仕廉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社会调查的学派之争,毋宁说是反映了民国社会调查运动内在发展的趋势和动向。而且也正是这样的“学派之争”而非“门户之见”,才是现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一。

与此相关的,便是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或者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调查学的建立与发展。当时从事社会调查的学者无不深知,对社会进行调查要取得圆满的结果,是与被调查的社会本身有一个圆满的良性运行状态密不可分的,尤其是举办全国性的国情调查或人口普查——这也正是当时学者的最高目标,若非“政治之修明,法令之普遍,苛捐杂税之免除,土匪之肃清,不良军队之裁汰”,即令勉强实施,也是徒劳无益。但他们也同样明白,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又绝非一点一滴的改良可以一蹴而就。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亦即选择某一村落或县份从事小范围的地区调查,是为“实验调查”。其目的,一则为正在兴起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素材,或为局部地区的社会建设提供政策建议,更重要的则是在调查的组织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使源自西方的现代社会调查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调查体系,也为更大范围的国情普查或人口调查奠定方法论的基础。所以,翻阅当时的调查报告,我们往往会发现作者一般都在其开篇或结论处对整个调查过程作一番细致的交代,有时甚至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更无论那些专门探讨调查理论、介绍实地调查经验的专著了。于是,我们发现,这些往往出于反对革命或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社会调查,最终并没有通过其所服务的社会改良活动,营造出一个适合社会调查的社会,但是在其所反对或质疑的革命终于打倒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它们的成果又成为新中国社会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智慧资源。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成功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费孝通先生在质疑土地革命的理论时运用社会调查提出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不也一度成为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之路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把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称为近代中国的一场

学术革命,或许并不过分,至少它也是这场学术革命的一部分。

一旦弄明白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的性质、地位与过程,这些调查对当代中国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多重意义也就凸显了出来:

史变迁的真实过程。

民国调查资料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多得多。根据 1930 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刘育仁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仅从 1927 年到 1935 年的 9 年内,国内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 9027 个,平均每年 1000 个以上。(参见赵承信:《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 9 卷,1936 年)因此,可以预计,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献的整理,将是一个难以完结的学术工程。至少到现在为止,在长期的资料搜集和文献追踪的过程中,我们以及学界同行总会时不时地有新的发现,有时甚至是惊人的发现。我们只能希望借助于广大同仁的共同努力,来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

就目前所知,有待我们深入发掘的文献宝库至少有以下这几个方面:其一是民国时期公私高等院校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本科生、研究生以社会调查形式撰写的大量毕业论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当时的燕京大学、私立岭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四川大学等,这种类型的调查绝大多数尘封在相关高校的图书馆里,鲜为人知,而其学术价值并不逊于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尽管也有一部分这样的毕业论文曾公开发表,但是往往出于对被调查者权益的尊重和保护,而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割舍掉了。比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蒋旨昂的《卢家村》,曾对“完全是私生活,不愿为局外人言的”,“关于村中领袖间的暗潮”,“原原本本地获知并详记下来”,但是“因为这些领袖们尚在,不好意思为他们一一揭穿,若稍加掩盖,便不易明白”,最终“不得不加以割爱”,然而正如编者所言:“这是何等可珍异的材料?”(《社会学界》第 8 卷,1934 年 6 月)其二是一些研究机关当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却未能将调查得来的数据和资料整理出来,写成研究报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1929 年和 1930 年陈翰笙主持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学界一般称为“无、保调查”。这次调查以及之后其他学者所做的几次“跟踪调查”所保存和整理的资料,构成了近百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性农村经济资料谱系,迄今为止,尚没有学者真正系统地利用过。第三种情况是,虽有研究报告面世,但所用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一部分则散落于民间或地方档案馆。山西大学岳谦厚先生对 20 世纪 40 年代张闻天晋西北调查资料的重大发现,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此外还有中国学者做的对中国社会的调查,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以外文发表的,其中除已经翻译过来的以外,尚有大量不为人所知。至于民间私人的收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总之,这确是一个无底洞,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气馁,我们倒是应该像当初的调查者一样,以一种不懈怠的“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地,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虽然不可能做到“一个也不能少”,但至少也应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大体的轮廓。我们想,只要有福建教育出版社的大手笔和大气魄,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样的夙愿。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大体上是第一

单行本,但是找起来比较容易的资料,这一次也没有收录。比如在“乡村经济卷”中,我们就没有收录由孙晓村主持、陈翰笙参与总体设计的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系列农村调查,即浙江、江苏、河南、陕西以及广西、云南六省农村调查。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美籍学者卜凯主持的最重要的两种调查《中国农家经济调查》和《中国的土地利用》,已为学者广泛引用,这次暂时不予列入。还有就是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主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民族学家的文集中都包含有一部分的调查,包括单行本和当时已发表、未发表的论文,这次同样不准备重复录入。应该说,此次收录的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界找起来不是很容易的资料。如“人口卷”里收集的调查,基本上是县级或省级的调查资料,属于地方性的人口普查,目前的人口史学界已很难见到。其中特别是陈达在云南做的调查,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有油印本,但均有不少页码字迹不清。我们是对这两个油印本进行仔细对照和核对,才得到现在的版本。这个调查对以后的人口调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如此等等,因数量较多,兹不一一列举。

当然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特别是对调查的选择标准和分类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斟酌,而且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肯定还有许多遗漏的地方。毕竟这是一场接力赛,我们还有机会弥补曾经的遗憾。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我们这项工作,正如在第一编的编辑过程一样,始终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其中既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院和校领导的支持,也有各兄弟院校和研究机构众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帮助,当然也得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以及国内其他图书馆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供了个人的珍藏,如陈春声、行龙等先生,都向我们惠赐了宝贵资料。在“法政卷”中有一本书,名为《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则是一位知名的加拿大援华专家、著名的《十里店》的作者之一,Isabel Crook 女士,特地给我们复印的。所以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学术界共同的成果,完全可以说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借此机会,我们向各方面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次编纂工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及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的资助。作为课题组的成员,李章鹏、郑清坡、邱志红、毕苑、沈洁等同志承担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协助编辑的工作。其具体分工如下:

| | |
|-------|-----|
| 乡村社会卷 | 郑清坡 |
| 乡村经济卷 | 郑清坡 |
| 宗教民俗卷 | 沈洁 |

人口卷
近代工业卷
社会组织卷
法政卷
城市劳工卷
文教事业卷
少数民族卷

郑清坡
李章鹏 郑清坡
邱志红
邱志红
李章鹏
毕 苑
李章鹏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 **乡村社会卷**

目
录

| | |
|------------------------------------|--------------------------|
| 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 | 许仕廉 (1) |
| 北平市四郊农村调查 | (11) |
| 清河村镇社区 | |
| ——一个初步研究报告 | 黄迪 (29) |
| 北京西郊挂甲屯家计调查 | |
| ——华北综合调查所所员养成所学员练习调查报告 | |
| | 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71) |
| 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 冯紫岗 刘端生合编 (122) |
| 山西阳曲县二十个乡村概况调查之研究 | 刘容亭 (179) |
| 山西阳曲县三个乡村农田及教育概况调查之研究 | 刘容亭 (208) |
| 山西高平陵川神池三县十六个乡村概况调查之比较 | 刘容亭 (219) |
| 山西祁县东左墩西左墩两村暨 | |
| 太谷县阳吕镇平遥县道备村经商者现况调查之研究 | 刘容亭 (226) |
| 太谷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 | 武寿铭编著 (252) |
| 兰溪农村调查 | 冯紫岗编 (308) |
| 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 | (425) |
| 上海市百四十户农家调查 | (489) |
| 上海市中心区百零六户农民生活状况调查录 | (537) |
| 昆山县徐公桥乡区社会状况调查报告书 | (546) |
| 嵯山渔村调查 | 江苏省立渔业试验场编印 (555) |
| 安徽省芜湖县第四区第三乡农村调查 | 江国权 (587) |
| 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 | 李柳溪编著 (610) |
| 武昌凯字营蓬户教育实验区概况 | |
| |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调查队编制 (693) |
| 华阳县农村概况 | 叶懋 潘鸿声著 (702) |
| 本馆办理民众教育实验区社会初步调查报告 | (772) |
| 湖南长沙崇礼堡乡村调查 | 孙本文 陈倚兴编印 (797) |
| 衡山县师古乡社会概况调查 | 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编 (809) |
| 新宁白杨乡社会概况调查 | |
| | 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第一二五班编 (938) |
| 广东番禺县茭塘司河南岛五十七村普通社会的与经济的调查报告 | |
| | 冯锐著 (993) |
| 樟林社会概况调查 | 陈国樑 卢明合编 (1018) |

